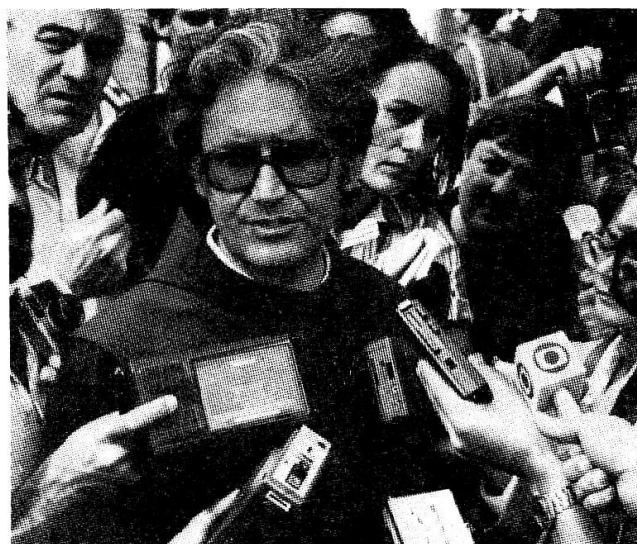


# 解放神學家與中國官員的對話

會友中心供稿

林瑞琪譯



去年十月，一群加拿大及巴西的神學家，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邀請到華訪問。巴西解放神學家包括 Leonardo Boff, Clodovis Boff, Frei Betto, Virgilio Uchca 以及 Agostino Pretto。以下是他們與中國宗教事務局官員會面交談的簡報。

訪問團第一站到了北京，中國宗教事務局副局長曹錦如女士接見了訪問團。

Leonardo Boff 問：曹副局長曾說過，宗教人士能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可否談一談天主教在這方面扮演什麼角色？

曹錦如答：無論信教者與否，所有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意願，就是使祖國強大發展，使同胞能過更美好的生活。我們相信所有人民均支持國家為達成這個目標所釐訂的基本政策。每個人均在自己崗位上為整個社會作出貢獻。有些天主教徒也組織集體企業，以發展生產。天主教徒在社會雖然只佔少數，但同樣具有發展社會主義的作用。你們到上海訪問，將會見到上海市天主教知識份子聯誼會會長朱仲剛醫生，他為上海市組織了不少社會服務工作。

※ ※ ※

Clodovis Boff問：我很高興聽到，中國所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實際上就是把信仰連結社會主義。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屬於理論層面的，就是：依照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無神主義是否本質上必與馬克思主義掛鉤呢？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在拉丁美洲，我們採納一種不涉及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願意以信仰者的身份投身解放過程中。世界上存在著多種馬克思主義，比如：有東歐式的，西歐式的，古巴式的等等。當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帶有無神主義取向的社會哲學時，馬克思主義與無神主義之間的連繫是否只因歷史造成，抑或明顯有此必須？兩者的相連是本質上的必然，抑或純屬偶然的會合？

曹錦如答：我們黨的基本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以辯証及歷史唯物論去理解它。因此我們是無神論的。我們相信一切事物皆有客觀的本質，有其產生、成長、消亡的內在法則。按我們的理論，宗教作為整體的一部份，是一項歷史事實，也同樣有其產生、成長、消亡的內在法則。人們不能情感用事地說：「我愛它，所以它存在；我不愛它，所以它消失。」

雖然黨本身主張無神論，但我們並非要求全國人民也信從無神論，而事實上也不可能以行政手段去摧毀某些基於主觀因素而存在的事物。事實上，確有些人信奉了宗教，因此我們必須製訂宗教自由政策。

任何社會人士，包括中國社會在內，都對宗教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信奉宗

教、不信任何宗教，以及攻擊宗教。由於這三類人都存在於社會中，我們只可以要求他們彼此尊重。我們深知，即使有這些區別，他們都有共同願望，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偉大富強的國家。

在中國，有些人曾是教徒而如今成了無神論者，也有無神論者成了虔誠的教徒。這些民眾之間的差別在目前的國情下並不重要，我們不願擴大其中的矛盾。

※ ※ ※

Leonardo Boff 問：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之間有甚麼關係呢？中國容許某些企業獨立自主，有些教會組織亦開辦工廠以賺取收入。

一位在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答：目前中國有國家企業、集體企業及家庭企業，三者並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不同形式擁有權的並存，有助於促使國家達成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集體願望。我們目前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肯定大部份為國家企業。

我們了解到社會主義是整個國家生產的原動力。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發展這種動力，以改善民生。當整體生產有所增長時，普羅大眾能享有較佳的生活，這也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之一。這三種擁有權都有助我們達成共同的願望，因此並不抵觸我們的社會主義觀念。

※ ※ ※

Frei Betto問：政府當局有三種處理宗教的方法，就是：操縱宗教，令它為政府服務；讓宗教維持在小圈子範圍內；或把宗教安插入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我以為中國是採用第三種方法。我想問：為何

一個中國信徒不可以成為黨員呢？這一點似乎與 Bakonin、居倫敦時期的馬克思及列寧本人所持的立場相違背。

曹錦如答：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也是唯物論及無神論者。所有中國共產黨員均是無神論者。雖然在政府中佔重要職位的全是黨員，但他們僅屬少數，在全國十億人當中只佔四千萬。

宗教信仰只是次要的考慮點。國家不會鼓吹討好宗教，也不會刻意難為宗教信仰者。我們要集合所有人民，組成統一戰線，一起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宗教信仰者，無論是佛教徒、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都曾與我們合力實現國家的解放，亦曾並肩對抗日本侵略者。似乎在宗教信徒與共產黨員之間也有很多友誼。宗教信仰並不阻止信徒參與黨所發動和指導的運動。

※ ※ ※

離開北京後，訪問團到達了南京，與江蘇省宗教事務局張秉鐸局長見面，並進行交談。

Frei Betto問：文革時期宗教事務局有甚麼遭遇？之後，人們對局內的活躍份子有何看法？

張秉鐸答：文革期間，宗教事務局關閉，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重開。關閉期間，很多工作人員都被送到農村或工廠去，有的去接受再教育。

那些參與文革者並未受到整肅，因為我們不願意重蹈文革本身的錯誤。當時，很多年青人沒有足夠能力去認清他們行為的惡果。後來，經過再教育之後，他們醒覺到從前教育的不足，無力履

行在文革中所佔的要職。在派系之間的鬥爭中，受害最多的往往是年青人。

※ ※ ※

Jean Menard 問：在社會主義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曾發生不少插曲，舉例說，在古巴、智利及尼加拉瓜等地，教會曾因害怕失去勞工階層而作出過激的反應。按你的經驗，你對這些教會的消極回應有甚麼評語呢？

張秉鐸答：我們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有共同理想，以統戰為目標。我們是一個貧窮、落後、有待發展的國家，無暇顧及這些宗派間的糾紛。

在目前發展階段，我們需要每個人的幫忙，有信仰的人與沒有信仰的人共同合作是很重要的。我們為甚麼這樣關心教會人士呢？為甚麼如此善待天主教徒呢？是因為我們宗教局及我個人作為局長的目標，均在於推動全江蘇省的十七萬天主教徒，與其他有信仰的人士一起，共同為克服本省的貧困、落後而努力，以促進經濟及社會方面的發展。

※ ※ ※

Leonardo Boff 問：很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都改變了他們過往對宗教的看法。這些轉變有否引起貴黨的回應？

張秉鐸答：明顯地，我們談的是理論層面的事。我們的立場並不完全是為現實或權宜。黨內切實地研究過這個問題，並於一九八二年發表一份文件，清楚地說明黨目前對宗教的看法。過往我們的立場是極左的，認為宗教全無價值。不過，這份文件卻提到，我們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內，宗教會繼

續存在下去。宗教反映出人民中的某些事物，經過四十年的社會主義發展，這個現象依然存在。人民的思想仍未完全進步。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會維持多久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把共產思想及共產主義建設好後，黨與宗教都將不會繼續存在。

這份文件談及宗教的五個特性：首先是它的長久性；其次是宗教的國際性；第三是它的群眾現象，包羅所有階級及年紀。宗教的這三種特色是緊緊互扣不可分割的。第四個特性是宗教的國家民族性，這也許對天主教不適用，但大家也知道在穆斯林及喇嘛教信眾中，種族與宗教信仰是二而為一的。這四種特性確立了宗教的持久力。這就是何以我們宗教局堅持尊重宗教信仰及保護宗教合法權益的政策。

※ ※ ※

最後，我們訪問了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張志群。

Leonardo Boff 問：西方及蘇聯的共產黨均改變了他們的宗教政策。他們大多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政策本身，而是執行政策的幹部太保守，對待宗教的態度太差，也很難用新政策去再教育他們。你們在中國有同樣的問題麼？

張志群答：我們的情況與蘇聯不同。我們也知道他們最近推行的改革，尤其是那些影響宗教政策的改革。儘管意識形態相近，但歷史、文化及社會結構都不一樣。一九七九年黨大會議上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路線。整體來說，我們的幹部都明白宗教政策的取向。當這些政策傳

達到教會的領導人方面時，他們同樣能明白新的政策。我們交流對政策的共識。由於我們繼續有相同的目標，團結一致為祖國的現代化而努力，也由於信仰的不同是次要的問題，因此我們一起面對著同樣的需要和同樣的挑戰。我們的目標不單在於協助宗教或是天主教會，把內部事情辦得更好，我們更希望人們能明白到真正的宗教政策是甚麼，宗教的真正目標是甚麼，好能落實宗教政策，而不是流於一紙公文。

※ ※ ※

Luiz Vasconcellos 問：按你的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指甚麼呢？

張志群答：我們估計這個階段約有一百年之久。到了公元二零五零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到達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接受的水平。完成初級階段之後，我們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直至達到完全發展為止。根據馬克思主義，到達最後階段時，宗教將不再存在。從初級階段發展至最後階段的過程中，宗教將繼續存在，甚至有所發展。在我國，有些人接受了較高深的教育後，仍保留其宗教信仰。但這些信仰並不如我今午所聽到的解放神學那麼複雜。為我來說，神學與信仰有很大的分別。當然，巴西的情況有助我們認識解放神學。假如按巴西的社會現況衍生出解放神學，則按中國的現況，也應衍生出另一套不單只與信仰有關的神學反省。而這種神學必須出於中國的社會實況，並尊重我們的獨特性。在目前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現象仍有待延續及發展。